

1949年以来的澳中关系

60年贸易与政治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post 1949

Sixty Years of Trade and Politics

王 毅 (Yi Wang) 著

喻常森 等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1949年以来的澳中关系

60年贸易与政治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post 1949

Sixty Years of Trade and Politics

王 毅 (Yi Wang) 著

喻常森 等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49 年以来的澳中关系：60 年贸易与政治 / 王毅著；喻常森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6
ISBN 978 - 7 - 5097 - 5691 - 1

I. ①1… II. ①王… ②喻… III. ①中外关系 - 国际关系史 -
澳大利亚 - 现代 IV. ①D829. 6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5369 号

1949 年以来的澳中关系：60 年贸易与政治

著 者 / 王 毅 (Yi Wang)
译 者 / 喻常森 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高明秀 许玉燕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 / 王绍颖
项目统筹 / 高明秀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7.25
版 次 /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字 数 / 265 千字
印 次 /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5691 - 1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3 - 9283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版权声明

© Yi Wang, September 2012

This translation of Australia – China Relations post 1949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本书根据阿什盖特出版社 2012 年版译出。

既不是冷门，也不是显学

我很高兴您在看到书名之后没有就此罢手，而是继续翻看着、思索着。无论您出于何种动机翻看这本书，既然肯花时间这样做，我猜想您不仅是一位具有国际视野的读者，而且对澳大利亚或多或少抱有兴趣，至少没有持不屑一顾的态度。这使我看到了希望。

我最初对澳大利亚表示兴趣的时候，周围的人大多流露出鄙夷的神态，这是20多年前我开始做出国梦时的情形。人们的鄙夷反而增加了我对澳洲的兴趣，使我最终不惜辞去铁饭碗，漂洋过海，负笈南寰。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与其随大流，做些锦上添花的事情，不如报个冷门儿专业，学成归国，或许能赶上机会做点雪中送炭的研究工作。

但独辟蹊径也是一种冒险，我虽然按时完成学业，可归国效力的愿望未能实现。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国内澳研依旧门庭冷落，另一方面是因为年轻的我没能抵御住资本主义“糖衣炮弹”的强大攻势，接受了国际企业的雇用，结果在西方职场打拼多年，直到最近才幡然悔悟。我现在虽仍然身居海外，但已经重新步入学界。

通过这两年的学术交流，我发现中国澳研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澳研学者不再孤独，澳研门庭也不再冷落。有人用“方兴未艾”来概括这一新形势，也有人用“雨后春笋”来形容几十所澳研中心相继出现在大江南北

的局面。拙作在这种形势下问世已经算不上雪中送炭，但系统探讨澳中关系的专著仍然缺乏（详见本书第一章的具体阐释），赶上这一时机成书着实幸运，否则不可能这么快就出中文版。这尤其应当归功于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特别是喻常森教授的不懈努力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但澳研远非显学，同美国研究和日本研究等相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够火爆并不是坏事，不温不火、细水长流其实更好，唯其中庸，方能持久。澳研不如其他一些领域发达，反而为那些有志从事澳研的人提供了更多施展空间。

作为一个跨学科综合领域，澳研在中国以语言文学为先导，进而扩展到文化、社会和经济等学科，而政治和外交研究较为稀缺。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近年来在研究澳大利亚政治和外交方面颇有作为，喻常森老师及其领导和同事所做的工作得到了业内人士的肯定，这正是拙作交由中山大学翻译的重要原因，我在此向喻老师和各位译者表示感谢。我还要特别提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该出版社对澳研的大力支持是有目共睹的，离开这种支持，上述许多澳研成果都无从谈起，本书中文版也不可能付梓发行，我在此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表示敬意。

历史与现实

历史永远赶不上现实。拙作截稿时，吉拉德仍然是澳大利亚总理，她领导的工党政府当时正在采取具体步骤发展对华关系，她任内出台的“亚洲世纪”白皮书重点提到中国在澳亚关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并鼓励澳洲中小学生学好中文。白皮书发表后引起了很大反响，但吉拉德的政治生涯也走到了尽头，三年前被她赶下台的陆克文卷土重来，再次执掌工党政府。吉拉德在告别政坛的讲话中特别提及对华关系，把她两度访华（尤其是第二次访华）所取得的成果作为一大政绩。

陆克文二度出山不仅报了三年前的一箭之仇，而且使工党支持率一度反弹。但好景不长，在上任十周后（2013年9月7日）的联邦大选中工党溃败，以阿博特为首的自由—国家党联盟获胜。陆克文虽然两度执政，但两次加起来还不满三年，无法充分实施他的执政理念，包括对华政策。大

选失利后不久，这位唯一会说汉语普通话的西方领导人宣布退出澳洲政治舞台，引退时仍然不忘用中文通过微博把这一消息告诉华人网友。

阿博特已有 20 年的从政经验，曾在霍华德执政时期担任内阁部长。阿博特政府上台伊始，其对华意图已略显端倪，有正反两件事可以说明问题。阿博特出任总理后不久，在印尼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向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的崛起是世界的福音，不是挑战，他希望两国尽快达成自由贸易协议；习近平主席也积极回应，表示期待中澳关系成为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典范。这是第一件事。

一个多月后便发生了第二件事，给双边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2013 年 11 月 25 日，也就是阿博特政府就职两个半月后，其外长毕晓普召见了中国驻澳大使，对中国宣布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时间和方式提出异议，认为中方的做法无助于地区稳定；中国外交部迅速予以回应，对澳方的“说三道四”表示强烈不满，要求堪培拉“立即纠正错误”。这篇序言落笔之时，双方的争执仍在继续。

这两件事说明什么问题呢？为什么阿博特刚刚向中国示好，毕晓普紧接着又向北京示威呢？他们难道是在唱双簧吗？要么是受到了美国的唆使？不然的话，为什么一方面呼吁在经贸上同北京达成协议，另一方面又在政治战略上对中国说三道四呢？这些问题的答案您可以在本书的有关章节中寻到踪影。我不是有意卖关子，因为本书涵盖的 60 多年历史反复涉及类似的问题，希望您通读全书后能够得出自己的答案。这正是所谓以史为鉴，历史虽然赶不上现实，却是现实的根基，不仅可以为人们当前的行动提供借鉴，而且可以为解开眼下的谜团提供线索。

译本与原作

翻译难，翻译双语人的作品更难。我羡慕中山大学诸位译者的勇气，这部书时间跨度较大，涉及大量历史人物、事件、典章制度和各类专有名词，他们不辞辛劳，在短时间内完成了翻译任务，值得赞许。由于时间和精力所限，我只粗略地翻看了一下原译稿，纠正了一些误译之处（这是无论多么高明的翻译都难以杜绝的），未触及原译文的筋骨；至于译文中很难

避免的冗长欧化句式，以及那些较为生硬的译法，我仅就目力所及之处，提出过些许修改建议。幸好有喻老师和出版社编辑最后把关，我现在可以坐享其成了。

拙作 2012 年刚出版时，年迈的母亲曾兴奋地戴上老花镜，手捧英文精装本反复端详，然后叹息道：“除了儿子的名字能认出来，剩下的字，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我听到这话，脑中闪过一个念头，想直接用中文写本类似的书，以飨母亲这样的读者，但未能付诸实施。现在中文版问世了，我正好借花献佛，以此奉献给养育我的母亲、栽培我的师长和关心我的亲友。

当然，译本毕竟不是原著。作为作者，我仍然对英文原著情有独钟，如果您是双语读者的话，不妨把原作找来看看，相信您读后会有不同的感受。

王 毅

2013 年圣诞节于墨尔本

■ 致 谢

我想感谢格里菲斯大学给我的鼓励和支持，否则的话，我既没有手段，也没有动力来撰写此书。尤其感激以安德鲁·欧内尔（Andrew O'Neil）教授为首的格里菲斯亚洲研究所（GAI）为我提供经济赞助，同时感谢语言学院（LAL）为我专心写作提供方便。我要感谢格里菲斯大学过去和现在的所有同事，是他们给予了我所亟须的鼓励和支持。

在长达 20 年的研究过程中，我一直有幸能够同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知名人士，包括前任总理、大使及各级官员和学者进行对话。由于数量太多，无法在此逐一列举，但部分澳大利亚人士在本书附录中列出。我想对所有花费时间与我分享真知灼见的人表示谢意，尽管我本人必须为本书终稿负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我求学道路上影响深远的两个人——帕特里克·韦勒（Patrick Weller）教授和南茜·维维安妮（Nancy Viviani）教授，他们不仅在 20 年前指导我的研究生学习，而且自那时起一直是我学术上的良师益友。他们分别是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科的权威学者，尤其在公共政策和外交政策研究方面具有高深的造诣，这使我能够在研究中借鉴二者之长，进行兼容并包的研究。我永远感激他们多年来一贯的支持。

从更实际的层面上讲，我要感谢苏珊·贾维斯（Susan Jarvis）在编辑方面给予我的协助，她使我避免了不必要的失误，也确保此书在体例上符合出版社的严格要求。我还要感谢阿什盖特（Ashgate）的编辑和职员，特别是玛格丽特·雅戈尔（Margaret Younger）、萨迪·科普利美（Sadie Cop-

ley-May)，以及尼克·温（Nick Wain），是他们提供的专业帮助，使得此书最终得以出版。还应提到希尔斯廷·豪盖特（Kirstin Howgate）在出版社发挥的领导作用和卡罗琳（Carolyn Court）在具体事务上的帮助。

同时，如果不感谢那些匿名的评论家们，这篇致谢也将不完整，因为正是他们博学多识且有见地的评论，才使这本书变得更好。确实，如果没有他们的大力推荐，以及阿什盖特出版社对我的写作提纲的积极审议 [包括在计划初期莫特森（Natalja Mortensen）的策划]，本书将难以面世。

我还对天津外国语学校 and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同学、BBC 和 SBS 的同事及 ABC 澳广同仁心存感激，各位的信任与友情我铭记在心。

最重要的是，我永远感激妻子 Michelle Li，感谢她无论顺境还是逆境，这么多年对我锲而不舍的陪伴和支持。若没有她在精神上、学识上、生活上的支持，我将无法完成此书。因此，我将本书献给她，以此对她忠贞不渝的陪伴表示由衷的感激。

王 毅

2012 年 5 月

目录

[C o n t e n t s]

前 言.....	1
第一章 导论：从“美帝走狗”说起	3
第二章 建交前的博弈（1949 ~ 1972）	12
第三章 从惠特拉姆到弗雷泽（1972 ~ 1983）	43
第四章 霍克时期（1983 ~ 1989）	73
第五章 从霍克到基廷（1989 ~ 1996）	114
第六章 霍华德时期（1996 ~ 2007）	165
第七章 陆克文时期（2007 ~ 2010）	193
第八章 回望与前瞻.....	228
附录 受访者名单.....	236
参考文献.....	242
译后记.....	262

表目录

表 2 - 1	澳大利亚对华贸易, 1947 ~ 1973 年	16
表 3 - 1	澳大利亚对华贸易, 1972 ~ 1983 年	51
表 4 - 1	澳大利亚对华贸易, 1981 ~ 1990 年	82
表 4 - 2	澳大利亚对华投资	100
表 4 - 3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	100
表 5 - 1	澳大利亚对华贸易, 1989 ~ 1995 年	133
表 5 - 2	澳大利亚对华官方发展援助计划, 1988 ~ 1994 年	136
表 6 - 1	澳大利亚对华贸易, 1995 ~ 2010 年	188
表 6 - 2	国外投资审查员会 (FIRB) 批准的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 1993 ~ 2010 年	190
表 7 - 1	澳大利亚对华贸易, 2006 ~ 2010 年	219

选题由来

在国际关系领域，对澳中关系的研究一直不足。尽管澳中关系越来越重要，但最近 15 年中，几乎没有出版过这方面的完整著作。15 年前——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及以前——曾有少数几本关于澳中关系的著作存世，但都出自历史学家之手，没有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视角加以研究的。

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已经吸引了研究人员和业界人士越来越多的关注，近年来，两国召开了很多相关主题的研讨会，但这些研讨会，只产生了一系列会议论文，分别涉及澳中关系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层面，而没有出现从政治学角度对澳中关系发展历程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著作。

所以，现在推出一部这样的专著正当其时。由于澳中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必要探究这种关系的过去，为我们了解现状和展望未来提供启迪。然而，本书并不局限于对历史事件的描述，而是试图通过历史回顾对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领域的三个颇为重要的议题进行考察。

第一个议题直接涉及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即澳大利亚在制定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时，是否依赖所谓“强大的盟友”，本书第一章将对此议题加以详细阐述。随后的章节试图回答澳大利亚在发展与中国的关系的时候，是否具有独立性的问题。

第二个议题涉及澳大利亚制定对华政策过程中，经济和政治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现有文献倾向于将经济和政治剥离，分别加以考察。经济学者

忙于分析来自双边贸易各个领域的数据资料，而政治历史学者主要关注两国政治和外交领域的议题。本书的研究，试图解释政策实施过程中，贸易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原因。

鉴于历史分析时间跨度大，自然会引出政策变化与延续这一议题。因此，除了探讨外交自主性这一核心问题、揭示贸易和政治的相对关系之外，本研究也会对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制定过程——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的变化与延续的模式加以概括。

第一章 导论：从“美帝走狗”说起

1995年5月26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在新闻报道中披露，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在堪培拉建造之时开始，澳大利亚秘密情报组织（ASIO）就在使馆内安装了光纤监听设备。翌日，ABC关于此事的更多细节报道成了许多澳大利亚报纸的头版内容（如《澳大利亚人报》1995年5月27日的第1版和第4版；《悉尼先驱晨报》1995年5月27日的第1版和第4版）。此类事件之所以受到如此关注，与其说是人们关心安装窃听设备对于中澳关系所造成影响的大小，倒不如说是澳大利亚公众担心该事件有可能削弱本国外交的自主性。

实际上，在别国外交馆舍安装窃听器的做法在世界上司空见惯，许多国家早已视之为公开的秘密，中国和澳大利亚也不例外。果不其然，中国大使馆发言人拒绝对ABC披露的事件做出回应。澳大利亚民众却被此事件困扰，因为监听设备不仅由美国提供，而且由美国国家安全机构（NSA）实际操作和掌控：监听设备窃听到的情报，通过位于中国大使馆院子附近的英国大使馆中转站直接发往华盛顿。这使得情报信息有可能在发回澳大利亚情报机构之前已被美国国家安全机构“过滤”。澳大利亚分析家因此担心这些被“过滤”的情报极有可能涉及中澳之间敏感度极高的粮食贸易谈判问题，因为其中牵涉与美国同行竞争对手的利益冲突，这就意味着，澳大利亚在处理与中国交往所需要的情报时，必须依赖美国的友好态度。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并不打算否认这些媒体报道，相反，而是启用所谓的D-警示（或者称“安全警示”）系统——在政府的要求下，和平时期自愿对某些

信息进行控制，以阻止媒体发布一些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信息。

依赖盟友还是另起炉灶？

这个事件牵涉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澳大利亚是否已经独立自主地执行其外交政策？实际上，长期以来澳大利亚民众一直持有这样的看法：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制定如此依赖其实力强大的盟友，以至于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几乎没有留给澳大利亚自行思考和行动的空间。本书通过探讨澳大利亚外交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与中国的关系——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亚太地区一个关键性的国家，同时也是澳大利亚外交决策者在该地区最为关注的国家——来挑战这一固有的观念。选取澳中关系作为出发点的另外一个依据是，在这一对关系中两个国家的规模和实力是不对称的。在国际关系中，中国被认为是一个大国，而澳大利亚则是一个小国或者中等强国，这对于澳大利亚是否独立制定并执行其外交政策，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是否凭借自主的、有意识的努力去保障澳大利亚自身安全与福祉来说，是真正的检验。因此，本书关注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

当澳大利亚不断降低与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的血统联系，并且逐渐增加其对于亚太地区的认同的时候，挑战澳大利亚依赖强大的盟友这一观念显得多此一举。然而，旧有的观念一时难以消除，并且对当今的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仍然有实际的影响——不仅澳大利亚，中国也一样。对澳大利亚的研究以往没有受到重视，澳大利亚为附属国的思维定式并没有随着时间和环境的转换而消失。

在中国，对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研究确实存在。然而，甚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最全面的综合性研究机构中，澳大利亚直到近些年才被纳入研究范围。中国社会科学院早就有美国研究所以及类似的以研究对象地区命名的研究所，直到20世纪90年代，原东南亚研究所才扩大为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将大洋洲地区包括进去。

对于澳大利亚研究的次优先考虑不仅存在于中国学术界。直到不久前，

每当有人提及澳大利亚外交，常常听见类似以下的回应：“小小的澳大利亚还有什么可研究的？如果你想了解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是什么样的，只要去看看美国的所作所为就可以了。”更多的时候，根本没人谈及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议题，上述典型的意见则普遍存在，尽管并非总是如此明确地表达出来。这种情绪在冷战初期非常常见，中国将一些西方的中小国家，包括澳大利亚，看作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一篇由中国学者孙辉明若干年前发表的文章，就体现了这种定式思维。根据孙（Sun，2002）的观点，澳大利亚战后外交政策重心长期偏向美国，澳大利亚的中国政策一直以来追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脚步，澳中关系的起落只是美中关系发展的写照。

然而，如果将上述态度看作冷战遗留产物，认为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后殖民现实缺乏应有的了解，那也未免过于简单化。类似的观点也可以在澳大利亚找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澳大利亚从事田野调查期间，经常惊讶地听到很多澳大利亚朋友对本人的研究主题评论道：“哦，你在研究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但是我们有外交政策吗？我以为我们只是跟随强国（的外交政策）呢。”澳大利亚专家的观点，当然不像这些大众观点那么笼统，而是更加具有洞察力，近些年尤其如此。很多专家认为 1972 年年底惠特拉姆政府上台可以看作澳大利亚国际定位的分水岭。在 1972 年以前，澳大利亚长期扮演一个依附国角色，开始依附于英国，后来是美国。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1989）对澳大利亚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概括的：

简要地说，1972 年的观点是，澳大利亚简直成了依附国，当其政策与强大的盟国协调一致时，才心满意足。无须深究便可以看出，澳大利亚似乎的确如此行事。例如，将 20 世纪 30 年代莱恩斯（Lyons）和孟席斯（Menzies）支持对于欧洲独裁者采取绥靖政策和 20 世纪 60 年代澳大利亚派遣军队前往越南战场的政策进行对比，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在 1937 年的联邦选举中，英国海军的能力以及对于皇家的忠诚是选举的主要议题。约瑟夫·莱恩斯在“配合英国”的口